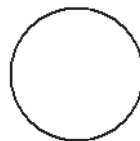


# 红旗

HONGQI



中共本央辦公廳七月十六日  
秘書局藏書

4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五八年 第四期

## 目 录

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	陈 伯 达 (1)
哪里找根据? .....	艾 恩 奇 (13)
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 .....	惠 庶 昌 (16)
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建立群众基础 .....	王顺桐 孟庆哲 (19)
群众在科学技术上创造精神的一个事例 .....	吴 象 (22)
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 .....	于 光 远 (26)
我国小麦总产量压倒美国 .....	孟 用 潜 (28)
除四害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	揭 杰 (31)
福建一个乡的奇迹 .....	福建省教育厅 (35)
南充专区发展地方工业的几点经验 .....	戈润生 卫广平 曹廷明 (38)



# 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

——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講演

陈伯达

七月一日是我們的党的生日。党从建立到現在，已經有三十七个周年。这是中国人民和我們的党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經歷曲折道路，而获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的三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十七年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人們看到，在我們党的领导下，在毛澤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已經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且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創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全国解放八年来造成的生产力，在某些方面說来，大大地超过了过去几千年造成的生产力。这还只是我国生产力解冻的开始。可以預卜，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指导下，今后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一日千里地显出新的面貌。

党的领导的成就，非常显著。因为我們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政党，是在毛澤东同志的指导下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党同人民群众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不論在革命方面或建設方面，都会不断地創造出使庸人目瞪口呆的奇迹。特别是在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后，六亿劳动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量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出現，乃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我們現在不可能全都料到的。

几千年来被压迫阶级早已有过消灭人剝削人、創造一个沒有阶级的幸福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幻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了多少次农民战争，其中許多英雄人物，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有福共享、有祸同当”的社会。但是，不論奴隶暴动也罢，农民战争也罢，由于当时沒有近代的大工业生产，沒有近代的工人阶级，人們不可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規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社会的现实。

高举科学共产主义旗帜的，是近代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的是列宁。他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和人类知識的成果，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規律，証明資本主义的制度必将死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必将起而代之。我們的党就是用这个共产主义科学，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这个伟大的革命科学的正确性和它的无敌的力量，一天一天地繼續为世界各国的大量事实所証明，也完全为我国的經驗所証明。帝国主义者恨透了它，咒罵着它，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附和帝国主义的咒罵，而又极端卑鄙地



加以各种歪曲，这些都不能丝毫有损于它的光輝。中国古代有人說得好：“人虽欲自絕，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当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給我們指出斗争的一般方向，給我們提出斗争的一般指导原理，而不可能給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开一张能够医治百病的药方，說是吃了这个药方，病就好了，革命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他們不可能把全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給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規定一个詳細的方案，好讓別人照章办事，坐享其成。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了馬克思主义，但我們也不能够向他提出这种要求。

馬克思和列宁都是我們伟大的导师。我們必須認真地向他們学习。但是，革命必須依靠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做，因此，各国工人階級的先进代表們在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去指导本国革命的时候，必須根据本国的情况，对于本国的具体問題，进行独立的思考。不能这样說，有了馬克思，有了列宁，就可以把自己的脑子封閉起来。恰恰相反，忠实于革命辯証法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經常要求工人階級的战士們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深思熟慮，分別看待各种具体的事实；要善于用批判的态度去检查別国的經驗；要認真地总结斗争的新經驗，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总之，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应当根据生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論。

修正主义者否認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因而墮入叛徒的泥坑；教条主义者看不见地平线上出現的新事物，因而否認馬克思主义的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在两条战綫上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誕生的时候起，就要求解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任务。大家知道，毛澤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就是因为他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而且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解决这样的任务，从而引导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进到又一个胜利。

能不能說，在这个原来經濟很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解决这样的任务是一件很容易或很平常的事呢？当然，不能这样說。只要回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向东方共产主义者所說的一段話，我們就可以了解，我們在这里所遇到的复杂任务，是过去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过的，而解决这样的任务，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說来，又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列宁是这样說的：

“你們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



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別崇高的任务，……。”

“你們必須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經常处在中世紀生活条件下的被剝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列宁这番話是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是对当时俄國境内东部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而說的。但是，这些話的内容，在实际上超越了苏联的境界。在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国情况差不多都同样，即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因此，列宁所提出的任务——按照他所說，叫做“极其巨大的任务”——在实际上同样地摆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毛澤东同志勇敢地而且非常杰出地在中国革命中解决了这样极其巨大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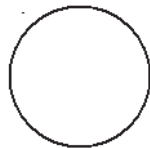
毛澤东同志善于考察和探索中国的各种特点，而毫不受公式主义的束縛。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毛澤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創精神紧紧結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百战百胜的威力。

在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斗争中，在为爭取中国两个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的斗争中，毛澤东同志同各种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同那种从右方面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那种从“左”方面来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进行了毫不調和的、激烈的斗争。他胜利了，因为真理在他这边，因为他提出了党的正确的路綫，提出了符合中国人民利益而不断地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宏伟理想。

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澤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錯誤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澤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末，也就没有現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所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在这里就若干对于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來說一說。

毛澤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首要的、特出的贡献，就是他分析中国的具体条件，認為必須在乡村中建設和发展革命的根据地，把乡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和农民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联盟的主要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出发点。过去有许多人按照西方从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一系列的經驗，按照中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經驗，造成了一种認為革命起义总是要从大城市开始的观念，而人們通常总以为游击战争只是正規战争的附屬或补充。毛澤东同志推翻了这些不适用于中国革命条件的老观念，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



城市的新观念，提出了把游击战争放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新观念，提出了在革命中经过游击战争把全民武装起来的新观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新观念使党的领导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得到新的斗争方向；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发展和丰富了这些观念，而终于使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能够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全国的胜利。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在革命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总结了农民群众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看出这类互助组织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的萌芽，看出这类互助组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以推广。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不久，就提出必须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农民中普遍发展临时互助组以至常年互助组，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这种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主要过渡形式，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就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关于资本家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区别了官僚资本家所有制和民族资本家所有制。对于前者，在解放时就已经采用没收的办法；对于后者，则采用逐步改造办法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的企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总之，不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或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是结合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都是大量地，而且普遍地推广多样性的过渡形式和过渡办法，并且因此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极其迅速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打破了我們中間一些同志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老观念，而认为除了解决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外，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还是不巩固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行猖狂的反革命进攻，人民内部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当人民群众全面地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之后，当人民内部经过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全面地分清大是大非之后，就出现了全民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还在江西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即已提出了又革命又建设的正确方针。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了这种方针。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之后，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大大地壮了解放区人民的物质力量，准备了在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物质基础。在经济、财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是把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批判了那种单纯依靠行政而脱离发展生产轨道的片面财政观点、片面分配观点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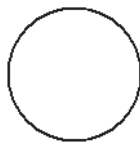


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交错着前进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从农业合作化方面所开始的种种迹象来看，指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浩大的、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中这样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那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因此，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解决后，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問題，是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的問題，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的問題，是“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的問題。

毛泽东同志是概括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而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問題。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以为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矛盾，特别是在人民内部，更似乎以为不存在什么矛盾，而任务很简单，那只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地“发展生产力”。在革命时代，他们承认群众路线是需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们觉得似乎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只要搞“业务”，有专家，有设备，也就行了，做得通了。只注意技术，不注意政治挂帅；只注意干部，不注意群众；只注意中央，不注意地方；只注意重点（提高）建设，忽视普及建设；只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注意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只要求最新的技术，忽视群众性的似乎“平凡”的技术革命。特别是有一种很不利于建设前进的、很有害的右倾观点，只简单地在财政问题上打圈子，而忽视群众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似乎以为不是生产支配消费、分配和交换，而是消费、分配和交换支配着生产。这类有害的右倾观点，在实质上成为一九五六年冬季所谓“反冒进”思想的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推翻了前面所述的一堆错误观念，指出这堆错误观念只能起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的深刻的观念。他把社会中的矛盾区别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为敌我的矛盾，属于对抗性的矛盾；一种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他认为，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矛盾随时都是有的。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出来。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出路不同。在我国现在，国外有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国内还有反革命残余，还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这些都是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已经出现新的矛盾，这是我国人民在前进中的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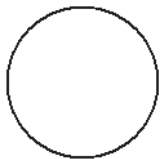
表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是敌我矛盾；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劳动人民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的，只能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解决，从而把社会的发展引向繁荣的新阶段，引向共产主义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整风的方法。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在这里，可以经过大辩论和适当调整关系，随时解决新出现的矛盾，达到新的团结，来推动生产力的前进。比如，前面所说的政治和技术，干部和群众，中央和地方，提高和普及，重工业和农业及轻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最新的技术和改良的技术，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现在人民内部所存在的一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只要一方面，而放弃另一方面，这是片面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有的同志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只抓支流，例如放弃“政治挂帅”而单纯地去抓业务，不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单纯地去依靠行政的命令和各种不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这些更不用说是很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不只是创造性地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实现总路线的几个基本点：即，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几个“同时”，几个“并举”，就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主要总结。这是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提纲。提起了这样一个纲，也就使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由于党提出的这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起了总路线几个基本点的这样一个纲，群众的、地方的和中央各部门的各种首创精神也就都发挥起来了。去冬以来，中国生产力的飞跃，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目前中国大跃进的形势，最突出地说明了这点。毛泽东同志上述的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为群众所掌握，也就成为群众大力开辟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武器。

在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形势中，跟着就产生着许许多多新鲜的事物。这许多新鲜事物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





到现在为止，在出现的许多新事物中，有两件很有意义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新事物：第一，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第二，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

现在不但县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也在办工业。总的口号叫做“全民办工业”。这样也就在逐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封建时代，存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资本主义把农业和工业分裂了，而且使城乡资本家剥削乡村以自肥；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农村中开始形成没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新农业和新工业的结合。很多工厂虽然是叫做“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来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依靠群众对于技术的革新和创造的冲天气概，人们可以看得见，这类用“土办法”办起的“小小工厂”，就会逐步变成现代最新式的工业。县县如此，乡乡社社如此，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数量变成质量。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报告所说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随着国民经济普遍高涨而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知识分子求知欲望的普遍高涨。现在全国文化教育的情况，正在开始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这样的伟大方向前进。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需要，不但要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乡乡办中学，而且有些县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综合性的或专业的高等学校，甚至有的农业合作社也办起业余大学来。河南孟津县平乐乡翟泉农业社是全国合作社创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据报载，这所业余大学设立十七个系，有学生五百一十九人。“他们的学习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密切结合。在课堂内，学习书本知识，掌握理论；到田间以作物为教材，进行实地操作试验。”这个新型的业余大学对于该社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作了有益的贡献。各地工人群众正在努力提高文化，学习科学，力争攀登世界技术的高峰，并且在短期内，开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许多城市里的工厂已经办了各种学校。例如，太原钢铁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文化教育机构，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钢铁学院，参加各级学校学习的职工有一万人。最近北京、太原、重庆等地的工人们正在冲破“通不能专，专不能通”的思想束缚，力争通晓多种技术，要求成为又红又专又通的共产主义式的工人。由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开始，一些地方的工人正在出现学哲学的热潮。他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天津的工人说：“咱光有技术，摆不出道理来，好多事都办不了”。这就在高度的原则上说出他们学习的目的。在河南登封县三官庙，群众有这样的评论：“乡干部学习哲学后，出现了三大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少



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就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将逐步成为启发一般劳动群众的智慧的钥匙。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党中央在学校中开始推行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业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校除了组织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之外，并且还由师生合作，白手成家，在学校中搞起大小不等的多样性的工厂或农场。由于教学和生产的实际相结合，课堂的功课和现场的操作相结合，又是读书人或教师，又是生产劳动者，就使得他们的智慧很快地开了花，结了果。教学的质量提高了，同时还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甚至已有一些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的产品。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认为又做工又读书的制度，会降低教学质量水平或浪费学生时间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业已完全破产。应该了解，按照传统的学校制度，一个人如果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总共就会花费十六七年的时间，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这种教学制度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有一套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即应该是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彼此脱离；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成为多方面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使受教育者为片面的发展所局限，成为死背书本、“四体不动，五谷不分”的人。现在党中央正在继续研究制定一套适合于我国条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但是实际的模范已经大量出现了。可不可以说，在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方面，象前面所说的太原钢铁厂和河南孟津翟泉社所办的大学，在实际上已经走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的最前面呢？可不可以说，那样的大学将不仅是一切工厂和合作社办学的先进旗帜，而且还是全国一切大中小学都应当效法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象各地的工人要力争成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多面手”，象“红旗”第三期刊载的湖北鄂城旭光一社开展的“万能人”运动，“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这些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先进旗帜，而且还应该是全国学校教育方向和学生们求学方向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我们这里的教育家们，如果要办好教育，应该先从创造这一系列新事例的工农们接受一些教育呢？我想，都应该这样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项措施的最后两项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现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点正在使这两项措施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朗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伟大作用的一系列事实看来，使我们重新回忆起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类的名言。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前进的。

毛泽东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是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因此，毛泽东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高举的红旗。中国人民将在这一面伟大红旗的引导下，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不断地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适合人民群众前进的需要，而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总是正确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前进的方向。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学习问题而向我们的同志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段话本身同时就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生活。

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毛泽东论学习问题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都将起着启发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应该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启发自己。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只要时刻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人民的前途着想，那末，在他那里，就会产生力量，就会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发现它的客观规律，并善于利用它的规律来为人民造福。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云南傣族一位老年妇女发现野鼠生活规律的一篇通讯和一篇谈话记录。这位老年妇女，名字叫做曹依秀，今年六十四岁。当然，我还没有看过她，但看到报上印出的她的画像，也就可以看出她是人民群众中一位充满自信心的伟大乐观主义者。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家，没有念过书，当然更谈不上进过什么大学，可是在昆明医学界，竟然作过一次被称为“引人入胜”的学术演讲。



她研究野鼠生活的规律，已经有了八年。她为了什么去做这个工作呢？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只有一个单纯的、但却是极高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消灭鼠疫。据云南日报报道：她的家乡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侵略者放下大量老鼠，散布鼠疫。一九五一年党和人民政府派人在那里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也就启发了她。“从此，曹依秀几年如一日地在早晨外出工作时，就一定要带着锄头去，沿路留心看有无老鼠洞，发现了立即就挖。后来她又想到，要彻底消灭老鼠，必须摸清它的生活习惯，以后在每次挖洞前，她就留心观察洞口周围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洞内的情形等等，顽强地进行研究。到现在，她共消灭了一万多头老鼠，进行了细心的比较观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一个普通的老年妇女竟然能够掌握了野鼠的生活规律，为人民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或许有人认为这算不了什么，野老鼠和我有什么关系？野老鼠这个问题怎么可以爬到我这个“科学家”的高贵头脑里来？但是，从人民的观点看来，这位老年妇女同那些有这类想法的所谓“科学家”比较起来，简直有不可能比拟的高贵。有许多大学生不是希望在毕业时候能够考上一个什么“副博士”吗？我想，这位没有读过书的老年妇女倒可以当一个博士，是人民的博士。她是一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众的真正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新社会的人物，是毛泽东式的人物。

我们大家不是很想当成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吗？不是想当一个人民的科学家吗？我就请大家想想曹依秀那样一副为人民的毛泽东式的好心肠；我就请大家看看曹依秀那样一派实事求是、苦钻创造的毛泽东式的风格。

大家大概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平日常说的：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曹依秀的做法也就是如此。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有的教授提出这样的公式：“理论——实际——理论”。听说，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公式。可见解放虽然有了八年，但唯心论哲学还在羁绊着你们，要你们做一个空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理论”中去。难道冯友兰先生反唯物论的公式在实际上不是表现这样的企图吗？哲学系的同学应该把这个唯心论的公式倒过来，而变为这样的公式：实际——理论——实际。

有些人只想当个“哲学家”。但是，哲学系的同学有没有考虑过，学哲学有没有什么目的？做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对人民有什么益处没有？搞了几年“哲学”，对人民的事业帮助过什么？人民培养了我們，我们就有义务来认真考虑一下并回答这些问题。不说的，仅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人民群众中还有许多迷信。有各种各样的迷信。我现在说的，是对于神的迷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或准备过进行这种破除迷信的工作？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类的工作，不值得去动用“哲学家”的头脑？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读过列宁所写的“论战斗唯物论的意义”这篇论文？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最好认真地把它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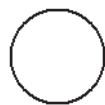


讀。列宁在那里說明为传播无神論有进行斗争的需要，同时又对于十八世紀欧洲老无神論者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讀过了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还是漠然置之？

在这里，我又想說一下安徽日报六月二十四日登載的“神的秘密”的一篇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通訊。合肥西部官亭南面的园洞山，原来传说有个神仙洞，最近忽然显灵了。洞里有仙方，吃了能治病，还可以使不生小孩子的妇女生孩子。到那里求仙方的人，除了要备香烛紙馬，还得带些花生、麻餅之类的东西去供奉。供奉之后，再把花生、麻餅之类的东西拿回来，也就成了神仙賜給的“仙方”。有很多人为了求得“仙方”，耽誤了一天生产，花了不少錢，有些老年人沒有錢买东西，急得把老母鷄都卖了。但是很奇怪，等到人們叩头之后，再爬到洞里去拿那些供奉的东西，只能拿回一点点。其余的东西那里去了？青年們怀疑，想进洞里去看个究竟。可是有些老年人說，东西是洞里的大仙吃了。他們不許青年人去冒这个險。一天，有一个老太婆带了兒媳妇，去求大仙保佑，讓她兒媳妇养个小孙子。这时原来不会說話的神仙忽然会說起話来了。洞里发出噙噙的声音：“只要你送床花被子，就可叫她养小孩”。她們被神仙的声音吓坏了，爬起就跑。在山下修塘的青年人晓得这件事，捺不住了，鑽进洞里，把“大仙”抓出来了。原来这个大仙，不是别的，就是那里的一个屢教不改的二流子。我想，如果我們有些哲学家能够发现这类神的秘密，或者把中国过去的筆記和小说所写的許多属于这类故事和材料編一編，进行一些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作了一件对农民有教育意义的贡献。可是，我們这里的一些哲学家所羡慕的，似乎不是这类的工作，觉得这算得什么？这怎能算是“哲学”？我想，这种哲学家可能自己也是想当大仙的吧。至少說来，这种哲学家，唯心論的哲学家，是大仙們的亲戚朋友。

听说，有些大学生——当然，不只北京大学，还有其他大学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到乡村去劳动，“太可惜”了，讀了这么多的書，还要去参加生产劳动，至少是浪费。在报上我还看过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乡下曾經貼过一张大字报，認為多劳动两个月，会把同学变成“无用之材”。不过，实际是一切的标准。什么可惜不可惜，实际总归是会給我們做結論的。象現在工农們的求知欲望那末旺盛，将来就不会只有一个曹依秀，不会只有一个象那位已經在全国聞名的治白蚁专家李始美，而且会有成批成批的人物出来，在文化和科学知識上繼續不断地大大超过大学生和教授。大家看了报就知道，現在有許多农民的小麦試驗田的产量高，已經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农业专家簡直望尘莫及。当然，我們尊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农学家。但是，有很多农学家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自高自大，藐視农民有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能力，結果就被先进的农民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列宁常常愛用这句諺語：“誰笑得最后，才笑得最好”。原来有些专家，有些科学家，笑农民落后。現在輪到农民来笑了。农民笑得最后，而且笑得最好。你們看，是不是这样？

当然，并不是只有在农业方面才出現这种情况。工人們的干劲和創造性，冲破了一



些所謂专家或科学家原来画的圈，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破世界纪录的东西。将来会从工人队伍里面，从农民队伍里面，跑出一批哲学家来，他们所懂得的哲学知识要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懂的。不信吗？实践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时间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

知识分子不甘落后怎么办？办法就是要决心同劳动群众结合，同生产劳动结合。办法就是首先不要摆出那种知识分子的架势，而是首先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是要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化。

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心，只要有满腔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热情，那末，任何人的智慧的发展都将是不可限量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将是无限量的。

许多知识分子很喜欢谈什么“学术权威”，而又很害怕自己会失掉什么权威。共产主义者承认不承认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的著名论文中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权威是需要的。你坐在船上，就必须尊重舵手；你坐在火车上，就必须尊重司机手。问题是要尊重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威，是要尊重代表真理、代表进步的权威，而不应该尊重那些过了时的权威，不应该尊重那些假权威。有些人在过去一定时间内曾经是权威，但他自我满足了，停顿下来了，天天吃所谓“权威”饭，不想再进一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很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结果人家进步，他不行了，只得当个落伍分子。至于原来就是个假权威，大家也就只好简直了当地揭穿了它。过去是权威，现在是否还可以是权威呢？可以的，但首先是要再当小学生。权威经常是从小学生来的。权威和小学生，经常要变化。小学生会变成权威，权威又会变成小学生。当了权威之后，不甘再当小学生，他就将不再是权威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在人民群众中，经常处在最高权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小学生。

在座的同学都叫做大学生。我在这里说话，又要大家甘当小学生，而且首先是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说得通吗？这是说得通的。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大学生，又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小学生。又是大学生，又是小学生，这叫做辩证法的对立的统一。

恩格斯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样写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在中国，正在展开着一个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伟大的新时代。处在中国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热情奔涌，才思横溢。这真是广大群众源源不绝地涌出自己创造力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旗帜给了我们以明确和坚定的方向，给了我们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旗帜下，充当前进的战士，为人民的幸福，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这个講演记录稿，经过本人整理和补充）



## 哪里找根据？

艾思奇

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发明用真空充氮处理方法消灭了蛋品中的沙门氏菌。当他的这项试验在进行的时候，一个全国有名的大夫责难他说：“这事恐怕不可靠，因为文献上还找不到根据。”马国荣没有被这一番威胁所压倒，他回答说：“根据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根据的终有一天会有根据”。结果是，马国荣胜利了，用文献来吓人的失败者。

这一件事情，不能仅看做个别的例子，类似的情形在目前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跃进，各项工作中都出现了许多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物。他们不甘心保持现状，藐视一切陈规，努力为创造新的成绩而奋斗。他们多数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是被一些名人、教授们认为学识浅薄，不在话下的年青人。但是，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斗争，就在落后的旧事物前面出现了许多鲜明的对立面，因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把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另一方面，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相信新中国能够飞跃地跃进，把旧时代的落后和迂缓看做是不能

改变的事情。一遇到群众中有了新的创造，就连忙摇头表示怀疑，或者站起来加以指责。这类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名人、教授。他们的主要资本就是比较多读了两本书，因此，书本、文献就成为他们反对新事物的主要武器。照他们看来，似乎书本、文献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极限。人们的思想、行动都只能以它作为最后的根据，谁如果在书本、文献里找不到根据，谁就不应该前进一步。

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应该有根据？当然应该有。根据就好比立脚点，好比建筑物的基础，没有根据，人就站不稳，建筑就要垮。思想没有充足的根据，无论怎样，都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就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名人、教授们才要用根据的名义来作战：首先把对方的思想、行动说成是没有根据的，这就好象可以压倒对方了。但在实际上，这里所要争的，并不是要不要根据的问题，而是如何找根据的问题。有些人以为，只要给自己的立论随便找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以算做找到了根据，不管这种理由是哪里找来的都好。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随着人们的观



点的不同，对于根据的看法也有不同。把書本、文献作为最大法宝的有些名人、教授們認為，馬国荣的試驗是沒有根据的，李始美治白蚁的創造也是沒有根据的。但是，照千千万万从事創造性劳动的人們的看法，这些名人、教授的所謂根据，并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根据。这里有着关于找根据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綫之間的斗争。一条是，認為根据都在書本、文献中，在人的主观領域中，这是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路綫。另一条是，認為根据存在于发展着的客观事物中，存在于能够認識和利用客观事物的发展規律来进行創造性劳动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中，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綫。

我們反对某些名人、教授們的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根据論。如果这种根据論是正确的話，那么事物就不会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也就不可能完成了。因为新的事物的出現，在旧有的现成書本、文献里常常是找不到根据的。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就其具体的方法和形式來說，原先也沒有从现成的書本、文献里找到过根据。

中国的民主革命曾經通过乡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战争过程而得到胜利。在初期，这个发展过程是在任何書本、文献里找不到根据的，因此，曾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反右斗争的政策，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整风形式，在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出版以前，並沒有现成的書本、文献作根据，然而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給全国工作带来了大跃进的形势。“依靠群众，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針，“长藤結瓜”，“白馬分鬃”，“葡萄串”，“滿天星”，都是群众的創造，沒有任何書本、文献作为现成的根据。因为有了这些創造，并且采取了其他許多办法，只在去冬今春的短时期里就給我国扩大了灌溉面积四亿多亩，超过了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成績，也超过了解放后八年来的成績。事实駁倒了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人們的思想和行动的真正根据，不能只是在書本、文献里去找，而應該到发展着的客观世界里，到火热的人民群众斗争里去

还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断定这个战争是持久战，而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是在中国方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論持久战”里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並沒有从任何論战争的書本、文献里去找这个根据。在当时的任何書本、文献中都找不到他那样的論断。毛澤东同志是这样回答問題的：“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問題的根据就在这里。”<sup>①</sup>这就是說，抗日战争之所以是持久战，而最后胜利又必然屬于中国方面，这个論断的根据，就是互相斗争着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双方在





当时的矛盾的具体特点和具体情况。毛澤东同志在“論持久战”里詳細分析了这些矛盾的具体特点和具体情况，就作出了上述的論断，而这样的論断，正是唯一正确的科学論断，八年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应当向迷信書本、文献的人指出：归根結底，行动在先；先有人們的創造行动和斗争，然后才有记录和总结这些斗争經驗的書本和文献。

在科学的書本文献中，正确地记录了前人的有益的經驗，或者是总结了前人的經驗而形成了正确的理論。这些書本和文献当然是需要的，是能够帮助我們的。但我們必須参考前人的經驗而做到后来居上，不能停止在前人的經驗上面；我們必須在正确理論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使得理論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而不能只是背誦理論的原則。

因此，我們虽然必須善于从有价值的科学的書本文献中找到帮助，但是决不应该用任何現成的書本文献来束縛自己的手脚。并且，有許多書本文献的内容是錯誤的，对我們的事业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此不但不能把它們作为根据，而且要加以严格的批判。

迷信現成的書本、文献，不敢在发展着的客观事物中和火热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找我們思想行动的根据，这是束縛人民群众的創造的积极性，阻碍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一种右傾保守思想。要贯彻“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必須坚决反对这种右傾保守思想。

① 毛澤东：“論持久战”，“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409頁。

## 一 个 更 正

“紅旗”第三期第五頁右栏第二行“士先氣質而后文艺”：“氣質”二字系“器識”之誤。这是唐初裴行俭的話，原語为“士之致远，先器識，后文艺”。（見“新唐書”卷一〇八“裴行俭传”；“旧唐書”“裴行俭传”里面沒有这句话。）我因字音相近，未查原文，致有此誤。承几位朋友来函指正，我查了一下新叫“唐書”，确是錯了。特此更正，并向指示的朋友致謝，向讀者道歉。

郭沫若



## 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

惠 庶 昌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广大农村青年的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青年中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

陕西省醴泉县烽火农业社主任王保京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农民，不久前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請为特約研究員。他的事迹上了报纸和刊物。从此，人們就称王保京是“农民科学家”了。王保京是不是真配得上称之为科学家呢？許多人有怀疑。說实話，一开始我自己也有点心里不实在。一方面我們都承認王保京确实有真才实学，贡献不小，另一方面又觉得跟科学家相比恐怕还差得多。这并不是由于不了解王保京，而是由于不了解什么叫科学家。总觉得科学家只能是念过大学的、长期在实验室搞实验的、有著作的、白发苍苍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象王保京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小学的、連短篇文章也写不通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跟“科学家”这个称号联不在一起的。現在明白了：这是把科学家神秘化了，这是迷信！

王保京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我們党培养起来的新型的科学家。

从一九五二年搞互助組开始，王保京就对科学技术“着了迷”，跟几个青年一起搞玉米高额丰产試驗，到一九五五年玉米

亩产就由二百多斤提高到一千斤，現在已达到一千五百斤。后来又搞小麦、棉花丰产試驗和麦棉两熟試驗，小麦亩产达到一千零二十七斤，比当地产量提高四倍，棉花亩产二百零八斤（皮棉），比当地产量提高三倍，麦棉两熟去年每亩收麦子九百五十二斤、皮棉一百零二斤。今年他們计划，玉米高额丰产要达三千斤，麦子达一千一百斤，籽棉达两千三百斤，一年五熟亩产折粮食五千五百斤。这些成績和计划都是以科学研究、先进技术作基础的。几年来他們試驗成功了麦棉两熟，創造了玉米丰产的八条經驗，并且用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的办法培育出“一五〇四”、“一五〇六”等四种玉米新品种，选育出“烽选一号”、“烽选三号”棉花新品种，选育出“五六一号”和“五六二号”小麦新品种，这种小麦具有秆粗質細不易倒伏、顆肥穗壯的特点。当前他們正在进行試驗研究的項目，在棉花方面有四十三种处理方法，在小麦方面有一百三十二种处理方法。光小麦品种就試种了一百一十二种，有秃头麦，有多头麦，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本国的，也有苏联的、日本的。最近他們社里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室”，根据县科学研究所的计划选定了九个新的科学研究題



目：(1)麦行套种、营养钵移栽、麦收后双格育苗移栽、大麦收后直播、小麦收后直播等五种不同处理方法的麦棉两熟试验；(2)一年五熟的套种试验；(3)玉米、大豆间作试验；(4)玉米品种比较试验；(5)玉米丰产试验；(6)棉花丰产试验；(7)甘薯丰产试验；(8)蕃茄丰产试验；(9)花生根瘤菌拌种试验。

他们的试验项目虽然繁多，但很有秩序。其原因有二：(一)一切试验为着一个目的：挖掘土地潜力，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大面积丰产创造经验。为此，他们的试验田有两种：一种是试验项目很多但占地很少、纯系试验研究性质的，由王保京和他领导的青年生产队负责；一种是试验项目较少但占地面积较大的，进一步研究已经在前一种试验田初步试验成功的方法，既是试验田，又是丰产田。在这种试验田试验成功后才在大田里普遍推广。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可以使新技术在推广中完全有把握，而且可以保证大田的增产不因试验而受到影响。(二)周密组织，大家动手。在科学研究室和王保京的领导下，以青年生产队和青年种植组为骨干，发动社员参加试验。现在全社所有的六十二名男女青年都参加了试验活动，成年老年中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试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个人人学科学，个个搞试验的群众运动。

要进行这样复杂的试验，一定会遇到千千万万的困难。王保京是怎样对待困难的呢？他说：“有困难，就想办法去解决

它；稳稳当当，慢慢腾腾，还叫什么跃进！”对待新的科学技术，王保京有一个公式，就是“能够办一马上办一办得到”，这跟保守主义者的公式“不能办一不去办一办不到”是完全不同的。王保京具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当他们推广了碧蚂一号小麦良种并取得丰收后，他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决心要弄清楚这种良种是怎样培育出来的。可是有人告诉他：“那是大学教授赵宏章用有性杂交培育出来的，而有性杂交复杂得很，连许多大学教授也还搞不成呢！”王保京不相信这些话，他想：“既然都是人做的，为什么大学教授能做，同样是人，农民就无法学会呢？”于是就动手试验起来，结果培育成了两种新的小麦品种。

王保京和许多青年一样，精力充沛，敢想敢干，勤学好问。现在王保京和农业社、青年队的骨干正在技术干部的帮助下，一边试验，一边系统地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如植物学、土壤和耕作学、肥科学、植物保护学和选种学等。他跟西北农学院的几个教授交上了朋友，并且跟东北、西南、北京等地许多科学家有联系，他们现在正在试验的一百一十二种小麦种子就是从全国各地交换来的。

王保京所以是新型的科学家，是因为他具有许多旧科学家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一)他既是科学家又是体力劳动者，他一边研究，一边实践，对王保京来说，科学研究同劳动实践完全是统一的。(二)王保京具有相信党、听党的话，为了社会主义勇往直前的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所



应当具有的共产主义的品质。当他在初次进行玉米亩产一千二百斤的试验时，有些老年人说：“保京这娃是二杆，吹牛皮要把火车掀”，可是他毫不动摇，因为他相信县委书记的话：“大胆试验，一次不成功二次再来，别害怕，有党撑腰。”几年来，凡是党的号召，他都首先积极响应，坚决贯彻。

(三) 王保京是一个跟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科学家。他不是把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当作“私产”，他不是避开群众孤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农业社的增产，为了全体社员增加收入，是跟全体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说，烽火社是一个农民科学研究的集体，是一个“科学院”，虽然没有科学院的那套设备。

有人说，王保京是个特殊人物，王保京能办到的，别的农村青年很难办到。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王保京这样的青年科学家正在到处生长起来。这里还可以举一个陕西扶风县春光社的例子。

扶风县春光社有一个青年生产队和七个青年种植小组，六十一个男女青年参加。他们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搞科学研究，总题目是“怎样科学用水”。这个社已经水利化，但有許多社员不习惯用水，说“麦是火里生，不用水来浇”，“棉花是旱田，浇水会疯长”，“浇夏无粮”。群众的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会科学用水，用大水漫灌的方法常常使庄稼减产。这个社的青年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科学用水的试验的。他们有单项对比试验田（如适时灌溉、定量灌溉、细水沟灌等），有综

合试验田（用水跟其他耕作方法混合试验）。两年来，他们经过试验普遍推广了适合本地粮棉生长情况的二十六项灌水技术，并且创造了有普遍推广价值的两项灌水技术：灌溉单宽流量和玉米拔节灌溉。青年们大部分都已掌握了一套基本的用水技术，并且可以讲出一套科学道理来。现在已有十七名青年担任了社里的水利技术员或农业技术员。他们取得了渭惠渠灌溉试验站的支持和帮助，订立了“联系合同”。今年他们选定了十五个新的科学研究题目，如水地棉花密植的最高苗数，水量、肥量对玉米丰产的作用，灌水流量和沟长，灌水后每次中耕的作用等等。这十五个题目如果只靠试验站的干部研究，十个人需十五年的时间，而依靠群众有一、二年就可以了。他们有田间记载册，有研究室，有试验场。不久前他们又在技术夜校的基础上与邻社一起成立了一个“农田水利学院”，学习中等农田水利学校的课程。我们认为春光社的青年中就有一群农民科学家，因为他们在进行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已经有了新的贡献。

这些事实，帮助我们打破了对科学的神秘观念，打破了对科学家的迷信。科学是客观事物规律的反映，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千千万万的现象，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加以综合、概括，成为科学理论，用这些理论去说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群众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就是创造和发展科学的泉源。既然科学是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产物，



那么科学就没有什么神秘。王保京和其他一些普通的青年农民成为科学家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实践是科学之母，劳动者是科学的主人，凡是诚实劳动而又敢于钻研的人，都有可能掌握科学，乃至成为科学家。有些青年同志说：“脑筋笨，没文化，钻不进，学不下，听到科学就害怕”，这是

妄自菲薄。

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可以培养出一个青年农民科学家，就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个青年农民科学家，就可以在青年农民中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队伍。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

## 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建立群众基础

王顺桐 孟庆哲

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有几个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就是：第一，理论不能密切结合实际。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农业的特点，中国农民的经验研究得较肤浅，因而，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增产没有能起应有的指导作用，很多时候甚至落在农民的实践的后面。第二，任务与力量不相称。中国地域非常辽阔，自然条件、经济条件非常复杂，增产要求非常迫切，而我国农业科学机构和农业院校里的研究人员很少，研究工作任务难于很好完成。第三，研究与推广衔接不紧，研究的成果不能及时交给农民加以推广。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曾经作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以前总以为科学研究只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事情，只在这个圈子里想办法，因此始终没有找到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

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上面三个方面的矛盾，关键是在贯彻群

众路线，在农业合作社中普遍建立科学研究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建立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农业合作社里能否建立科学研究工作呢？这是许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不相信的。但是现在事实上，已经在一些合作社里建立了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成效。在这里，我们来谈一谈山东省掖县的先锋农业合作社。

先锋社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很有成绩，科学研究方面尤其突出。它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而且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典型。这个农业合作社对科学研究工作动手得早，他们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学习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一九五四年就开展了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工作。这个社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规模比较大，方面也比较多，在耕作、选种育种、密植、除虫害、农具改良、畜牧、农产品加工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四年来，



他們共进行了七十六項試驗，四十六項已取得了成果。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这个社历年的增产都是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分不开的。这个社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下列几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一、凡是本社生产中提出的科学問題，都注意抓紧研究；別地已經使用的增产措施，都想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試驗。他們千方百計地从各地搜集到一百多种良种，对它們在本地条件下的增产效果进行比较，得出了各种适宜于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他們很重視农业科学書籍、刊物、报纸的学习，認真組織討論，弄清楚書刊、报纸上講的内容，并进行研究和試驗，把研究試驗的成果及时地用到生产上去。他們也很注意同本省和外省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先进农业生产单位取得联系，請他們解答問題，向他們索取資料。两年来，联系单位共有三十多个。他們的研究是很实际的，同时又是比較广泛的，因此，既能着重解决当前增产中的迫切問題，又为今后的增产开辟了寬广的途径。

二、建立了各种試驗田。他們同时搞小区对比、小面积丰产和大面积丰产三种試驗田。小区对比試驗田是科学研究的基地，也是带动和支援大、小面积丰产試驗田的基地，在小区对比試驗田得到的成果，及时在丰产試驗田推广，丰产試驗田需要解决的問題又提到小区对比試驗田中去研究解决。三者这样相互促进，带动了全社的增产。

三、建立了一套进行研究工作所必需

的科学方法。他們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做到观察細致、精確，作出比較詳細的記錄，对观察的結果进行分析比較。他們还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展覽室，陈列种子、作物、害虫、病害、土壤等标本和地温、气候、雨量等对比試驗的图表。

四、經常組織群众性的技术辯論，充分吸收群众的經驗。新的技术操作规程要經過群众討論修訂，对試驗研究的項目，也要进行爭辯，爭辯不一致时，可以各选一小块土地进行試驗，成为了真正的“爭鳴园地”。他們特別注意向老农学习，組織有丰富經驗的老农成立技术顧問委员会，并組織青年同老农訂师徒合同，使老农丰富的生产經驗充分地运用到試驗研究工作中去。

五、建立了一套培养干部的方法。他們采取了“自教自学、边干边学、互教互学”的方針。他們以莱阳农校农业技术課本为基础，吸收本社和外地的經驗，自己編写了业余农业技术学校的課本。从一九五二年的青年技术学习小組开始，在短时期內迅速培养出了一批技术干部和研究干部，特别是培养出了八名科学研究骨干，建立了专门的技术研究組。这八个人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分別被称为“治虫大王”、“地瓜大王”、“养猪专家”等等。这八个人的技术研究組同时又是业余农业技术学校的教研室，青年技术学习小組也发展成了包括高、中、初、飼养四个班的共有一百九十四名學員的业余农业技术学校，这样就保證了該社科学技术人員不断地扩大和发展，以适应农业增产的需要。



先锋社同全国别的社相比，在办科学事业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条件。他们社里有的不过是高小毕业生和少数初中毕业生，既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也没有优先得到外力的支援。这个社的前身是一个由十户贫农、两户下中农组成的互助组，五名男劳动力中四名是复员军人，一名是手工业工人，他们起先不仅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不熟悉，就是对于一般的生产技术也很生疏。有人曾经嘲笑他们说，这是“穷棒子加门外汉”，“过不了百日就要垮台”。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一九五二年春天种谷子时，没有人会用耩，只好先在大路上演习，等演习好了再到地里种。他们曾向富裕中农请教玉米间作豆子的技术，这个富裕中农却说：“庄稼，庄稼，都是撞出来的，有什么讲究”。明学不成只好暗地偷看，再照样去作，但是出苗时，却比别人多一行豆子。原来人家是两只耩角下地一只堵住，用一只下种。别人嘲笑说：“互助组真高明，豆子比别人多了一行”。但是他们不服输，加强管理，结果每亩比这个富裕中农还多收了几十斤。不懂技术的困难情况没有使他们退缩，而是加强了他们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决心。保守落后人物的嘲笑没有使他们畏缩，他们更坚强地战斗下去，取得胜利。每一次斗争的胜利，又吸引了更多的群众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一九五四年试验谷子宽幅条播密植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兑钱，哪里是种地”。老社员张元才很不满意，认为这是把地糟蹋了。谷子出苗后，张元才

说：“走到这里不能睁眼，一看就气得慌！”苗长得很好，他说：“不要看现在苗长得好，将来出不了穗。”出了穗，他又说：“出了穗也结不了粒，只能用来喂牲口”。到谷子成熟的时候，他拿起镰刀割了一把，这才有了笑容，说：“怎么沉甸甸的！”结果，亩产八百二十三斤，比一般亩产三百四十斤，多打了一倍以上。张元才买了酒，硬拉着支部书记和社长去喝，他说：“良种密植，老汉服了”。后来，当他们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试验，如小麦杂交、小区对比试验时，受到了山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和县的技术组组长等人的阻挠和责难，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说，太好高骛远了，设备、“人才”都没有，乱搞什么。但是，他们在总支、社委会、区委、县委的积极支持下，坚持工作下去，终于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苦学、苦练、苦干、不断和保守落后思想作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先锋社可以办到的，别的合作社为什么办不到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在于有不怕困难、敢想、敢干的精神。在全国普遍推广先锋社的经验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全国农业合作社都象先锋社那样建立科学研究工作，那么，全国农业科学就有了坚固的群众基础，一个以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的庞大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网就会形成起来。这样，几年来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理论和实际、任务和力量、研究和推广等矛盾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



# 群众在科学技术上 创造精神的一个事例

吴 象

山西省清徐县依靠群众，用土法大量制造优质化学肥料，开展乡社造化肥运动，不到两个月，就组织成一个以县属化工厂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化肥网，基本上实现了化肥普及化，从而使全县亩产千斤的跃进指标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过去人们总认为搞化学肥料不简单，如果没有大量的设备和专门技术人才，就根本不用去想。今年四月，清徐县化学工业社却依靠几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工人，用土办法从卤水中提炼出氯化钾、氯化镁和氯化钙，从草木灰中提炼出硫酸钾，又在这基础上试制成化学肥料和混合肥料。经过田间实验，肥效很高，同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出来的化肥差不多；经过农业技术化验所和太原化工原料公司化验鉴定，他们制成的化学肥料含氮0.29876%、五氧化二磷20%、氧化钾0.07769%，他们制成的混合肥料含氮0.32117%、五氧化二磷19.5%、氧化钾0.27386%。每斤可顶十六至十七斤人畜粪肥，能增产二至三斤粮食。

这个创造引起了中共清徐县委的重

视，并使他们得到一个重大的启示：既然能依靠群众解决水利化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依靠群众解决化肥的问题呢？县委越是

具体研究化学工业社的经验，就越感觉到这项经验是从根本上解决肥料问题的好办法。因为用卤水制造化肥，原料来路广阔，技术设备简单，操作简单，投资少，成本低，收效大。全县除一小部分山区外，都有这种原料，可以普遍推广。

县委作了专门的决定，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人人刮硝土，队队熬圪涝（即卤水），社社建立小型化肥制配厂，乡乡建立中心化肥厂，县建立化肥技术指导厂。”从此，对化肥的神秘观点被粉碎了，全党全民造化肥、乡社造化肥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全县计划建立县化肥技术指导厂一个，乡中心化肥厂十一个，社小型化肥制配厂一百三十五个，生产队圪涝房八百一十个。有的供原料，有的搞加工，分工协作。截至七月一日的统计，全县已有二百零二个化肥厂和圪涝房开工生产，其余的七月中旬可以全部建成开工生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国家花一文钱。按县厂日产五吨、中心厂日产三吨、社小型厂日产一吨计算，全县化肥年产量可达六万二千二百八十吨。全县五十万亩土地，每亩平均可施化肥二百五十斤，远远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达到的数字。如果以每





斤化肥增产粮食三斤计，每年即可增产粮食三亿七千多万斤，约可供九千万人吃一年。

## 二

清徐县化肥普及化的实现，不能不首先归功于化学工业社职工的创造，而化学工业社职工所以能用土法创造出优质化肥，首先是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清徐县碱地很多，硝土到处都是，百分之八十的村庄在历史上就有利用硝土生产卤水、火硝和土盐的传统。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人敢于设想从卤水中提炼化学原料。化学工业社的职工都是熬卤水的老手，以前也没有人敢这样想过。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们都在大胆地想，势如破竹地干。化学工业社的职工也打破常规，解放思想，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这几口铁锅、几个大盆和木桶来创造一些什么新的产品了。当然，思想是一步一步发展的。起初他们也没有想到可以制造化肥，只是一股子热情，要为农业大跃进出一把力。有时也闪过这样的想法：“卤水能当作肥料上地，里面必定含有化肥的成分，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上面打点主意呢？”但是，卤水里究竟含些什么，怎样才能提炼出来，却一点也不知道。全社十四个职工，文化最高的也不过是高小程度，操作经验虽然丰富，化学理论知识却谈不上。大家正在摸不着头绪的

时候，凑巧，湖南省供销社一个采购员到清徐来采购氯化钾、氯化镁等工业原料。他们便问：“这些东西哪里有呢？”那个采购员告诉他们：“卤水里就可以提炼出来。”他们高兴地追问怎样才能提炼出来，那个采购员却答不上了。

他们得到这个线索之后，便紧紧地抓住不放，打定主意要从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氯化镁。他们四出寻师、问友，千方百计地进行研究，遇到不少的困难。他们不懂化学名词，于是下决心鑽化学理论。工人张殿文跑到书店里，找着化学方面的书就翻，翻到里面有讲氯化钾、氯化镁或者化肥一类的就买，一气买了“化学入门”、“化学初步”、“工艺化学流程”等五六本。他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是他祖父、父亲都是干这一行的工人，他本人从十七岁起就和硝土、卤水打交道，十六七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把书上说的和实际生产中体会到的一对照，许多东西很快就理解了。当然，拦路虎还是不少。比如书上说到“用母液洗涤”，“母液”是什么就弄不通。好在他嘴勤腿勤，不懂就找人问，县里问不到就跑太原。他和太原化工原料公司的武步明技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老远跑去请他指教，武技师也很热情地帮助他、鼓励他。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就掌握了一般的化学理论知识，初步摸清了各种分子式和化学反应。

他的学习是为了应用，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从卤水中提炼化学原料和制造化



肥，而这却是任何書上找不到的。書本上曾提示过的一些提炼方法，都是用化学藥品，成本太高，他們根本不能采用。他便根据書本上找到的綫索，和別的工友們共同研究、討論，用他們自己的土办法試驗：熬煮——冷却結晶——烤干；这一次沒弄成，配上別的料，再熬煮——冷却結晶——烤干。試驗中又进一步和書上的理論对照起来研究，并尽可能采用科学方法。比如过去他們熬煮是憑眼力和經驗办事，連溫度表也不用。大家討論后感到沒有溫度表不準確，影响試驗，便买了溫度表。但开头誰都不會用，看来看去也看不出是几度，后来把它放进鍋里，发现水銀从細柱子里突突地往上爬，才知道原来从这里看溫度。他們遇到困难不退縮，遭受失敗不灰心，頑強地向科学堡垒进攻，一步一步地取得了胜利。

有一次，他們在太原一〇一工地发现建筑用的氯化鎂，同他們熬煮結晶出来的苦澁块形状、色澤相似，便送了一些請太原化工原料公司化驗。結果証明里面含氯化鎂88%，同时又得知如果能够提高到96%，就可以达到出口标准。这个胜利對他們的鼓舞极大，試驗更加积极了。后来他們打听到天津新生化工厂生产氯化鎂，又專門派人去參觀、学习。这样，由于解放了思想，敢于大胆創造，反反复試驗，苦学苦鑽，他們終于先后从卤水中提炼出氯化鉀、氯化鎂和氯化鈣，从草木灰中提炼出硫酸鉀。

他們在这个基础上繼續进行試驗，終于用这四种化学原料和石灰、骨粉等，制成了化学肥料和混合肥料。經過城关新光农业社青年队在西紅柿地試驗，肥效超过了硫酸銨，和硝酸銨一样。而且价錢便宜，每斤只要九分多錢。有些人听说清徐化学工业社制出了优質化肥，不知有什么設備，跑来一看，原来厂房是七坯墙的民房，一盘石碾，几口鍋，露天里放着一些食，只有洗滌用的机械，还是工人用手搖的。这样簡單的設備，却制造出不亚于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出来的化肥。于是，都不禁赞叹地說：真是海水不能用斗量，工厂不可以貌相啊！

### 三

从試制化肥成功，到全县遍地开花，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時間。但所以能取得这样快的进展，却不是沒有經過斗争的。前些时，县委不太了解化学工业社的試驗活动，而了解他們情况的工业局局长霍子讓，却偏偏又看不起这些土玩艺兒。他主张要搞就搞高标准的，工业社那么个小烂攤子，十几个人誰也沒有文化，不懂科学，能弄成个啥。他們的試驗他不支持，試驗出来的东西請他帮助送出去化驗，他还滿意地說：“你們想办法弄的，弄成啥算啥，我不管！”甚至化肥已經試制成功，工业社职工向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报喜，作为給“五一”劳动节的献礼，这喜报也被他压下了。



五月中旬，县手工业社主任杜乃福去参加榆次地委召开的地方工业会议，会议中间他向同去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曹立祥汇报了这项经验，引起了曹立祥的重视。曹立祥叫他在会议上发言，于是又引起了地委和省委的重视，要县委详细总结，组织推广。曹立祥回县以后，县委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县委严肃地批判了霍子谦瞧不起群众创造精神的右倾保守思想，并决定全面推广土制化肥的经验。第一步先把现有的六十一个农业社的圪塔房转为化肥配制厂。第二步按前面说过的计划全县遍地开花。六月十七日，这六十一个圪塔房都派专人到县化学工业社参观、实习。他们原来就识别土煤，会熬卤水，再一指点，几个小时就可以完全学会和掌握操作技术。回去利用旧房和原有设备，稍加补充和整理，几天就办起来了。有五个厂已制成化肥，因为原料和产品不用运费，每斤只合六分多钱。有了这一批厂作骨干，乡乡社社造化肥紧跟着也就可以实现了。六月二十三日，又组织了全县第二次大规模的参观、实习。现在，化学工业社已经和火硝社合并，转为县的化肥技术指导厂。尽管这个厂的外貌还是那样简朴，规模也没有扩大多少，但实际上已成为全县一百多个化肥厂和近千个化肥生产单位的中心。它不仅日产五吨优质化肥，

而且不断地帮助各厂大量培养技术人才，还可以帮助各小厂做些一般性的化验。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副厂长张殿文，已由一个只有实际操作经验，缺乏理论知识的一般工人，变为一个既有实际操作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新型专家。

化肥的普及化，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清徐县今年的亩产指标，已经由原订的四百斤骤增为一千斤，还要争取超过。全县喜气洋洋，大闹化肥，大上追肥，要在小麦丰收（平均亩产三百斤以上）的基础上，在秋季创造惊人的奇迹。

不久以前，榆次专区晋中十县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议，学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七月五日，中共山西省委又组织了全省各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及其他干部来这里参观。甘肃、陕西、广东、江苏、河南等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近也先后派人来参观。

“土办法”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法宝，因为批判了忽视土办法的错误思想，贯彻了在县营工业中实行“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土中出洋”的正确方针，土制化肥便在清徐全县开花结果了。可以相信，只要坚持这个方针，用不了多久，它也会在榆次全区、山西全省以至全国各地开花结果，给祖国的农业大跃进增添新的劲力。



# 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 工作的革命意义

于光远

我国广大农民经过过去冬以来几个月的苦战，战胜了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获得了小麦增产的惊人成绩。

根据初步统计，全国三亿六千多万亩冬小麦共计增产二百二十多亿斤，比去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强。这样高的增产幅度，在世界农业生产史上是闻所未闻的。经过这一步的跃进，我国的冬小麦产量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亿斤。

在这次冬小麦增产的跃进中，出现了许多大面积高产的地区，如河南省平均亩产超过五百斤的县就有孟县（五百三十八斤），偃师（五百三十四斤），博爱（五百二十斤），襄城（五百一十九斤），夏邑（五百一十八斤）等县。以夏邑县来说，这个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土地瘠薄，很大一部分是碱地和砂地，去年冬小麦平均亩产只有一百零七斤，今年一下子就跃进了将近四倍。

在这次冬小麦增产的跃进中，还出现了许多试验田的高产纪录。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的统计，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试验田就有二十多万亩，其中有许多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的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纪录。根据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卢克亚纽克所著“如何获得冬小麦的高额产量”一书记载，当时冬小麦的世界纪录是每公顷一百一十一公担，即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国农民在今年夏天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已为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

我国农民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了今年夏收的高产纪录决不是不可超过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农业社，今年共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亩，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队六十二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一十斤。这个社的试验田的产量达到了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他们总结了今年获得大丰收的经验，认为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计划明年种小麦两千亩，亩产五千斤，并搞八十亩试验田，亩产达到一万五千斤。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今年冬小麦的高产中得出的



結論。

小麦生产的这样的跃进，不能不在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認識上引起一个革命。“小麦是低产作物”这种陈腐观念被打破了。“农业只能慢慢地增长，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年增长的速度最高也只能是百分之四左右”这种陈腐的观念也被推翻了。

小麦生产的跃进，也不能不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上引起一个革命。广大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推翻了农业科学上的許多陈腐观念。

例如，有一些农业科学家一向輕視耕作栽培在提高作物产量上所起的作用。他們断定作物的产量是由品种的性能決定的，再好的耕作栽培也只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今年小麦增产的实践証明：在使用同样的优良品种的条件下，由于改进了耕作栽培方法，就可以使产量提高几倍之多。

拿密植來說，有一些农业科学家曾經为密植規定了他們的所謂絕對不能超越的“极限”。有人引証实验材料断言：“小麦每亩的株数不能超过五十万株，超过就太密了，就会不透阳光，不透空气，容易造成霉烂、倒伏，因而大大地减产。”但是，現在許多合作社已經用事实冲破了科学家規定的这种极限。湖北谷城县新气象五社，在亩产五千四百六十七斤的試驗田中，密植的程度达到每亩二百四十多万个穗子，据該社主任估算，每亩約一百八十万株左右，即平均每平方寸約三株。在这块一亩五分試驗田里，他們深耕一尺二寸，又上了一尺多厚的河滩淤泥，所用的麦种都經過黄泥选种和賽力散拌种，采用播幅六寸，空行三寸的寬幅，条播以后，又追化肥四十五斤，水粪四十一担，除虫三次。可見我国农民已經依靠冲天干劲和大胆創造能力，使土壤状况和营养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才能实现这样的密植。这是习惯于把各种因素孤立起来看問題的科学家所不能設想的。

现在把农民群众的高产纪录同农业科学机关試驗田的产量一比，后者就不知落后多少了。这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在一些研究机关和大学中长期存在的脱离实际、不願意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沉悶空气。农民群众能做到的，拥有大批科学技术人員和优良設備的研究机关和大学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問題就在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他們的思想上和研究方法上必須有一个革命。

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調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经验，虛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经验，并且加以分析和綜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更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从这些经验的总结中，无疑会大大推动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农业增产的任务，还要求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关在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学



习，掌握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敢想，敢做，密切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上的实际经验，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的研究，为农业生产开辟新的途径，把这些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迅速普及到广大农民中去，使粮食和各种农业作物的产量以更高的速度，更大的倍数增长起来。

今年冬小麦丰产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我国许多革命的科学工作者的干劲和大胆创造的热情；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满脑袋蛛网尘埃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对此抱着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散布各种消极和怀疑的论调，他们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傲慢偏见出发，顽固地不肯承认工人农民的伟大创造。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仍然转开脸去，说：“我们不相信！”甚至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参加了验收，仍然不肯承认他们亲自验收的高产成绩。他们抬出“科学”的牌子说：“小麦能收好几千斤一亩？这没有科学根据！”还有一些人竭力贬低这些成就的意义，说什么这些成就是偶然获得的，无法巩固的，说什么还得看三年才能见分晓。这种偶然论当然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试问，为什么高额丰产纪录没有“偶然”地出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为什么单单“偶然”地出现在我国农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闹技术革命的这个时候，而且单单“偶然”地出现在那些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各种丰产技术措施的试验田里？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些思想，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还是起着一定的影响的。为了促使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进一步的跃进，彻底批判各种错误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必须继续进行的一件工作。

## 我国小麦总产量压倒美国

孟用潜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今年我国夏收冬小麦产量达到六百四十亿斤，即三千二百万公吨；美国今年冬小麦的产量，据美国农业部的估计，可能达到二千九百零九万公吨。就拿这两个数字来作比较，我国超过美国近三百万公吨。加上春小麦，美国今年的小麦总产量估计是三千四百五十八万公吨，而我国的小麦总产量估计将达到七百三十亿斤，即三千六百五十万公吨，仍超过美国一百九十二万公吨。我国大量增产的春种大麦、豌豆、蚕豆等夏季粮食，还没有计算在内。人们知道，小麦是美国的主要食粮，而不是我国的主要食粮。尽管如此，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苏联。

特别值得指出的，去年我国冬小麦的产量近四百二十亿斤，即二千一百万公吨；而美国去年的冬麦和春麦的总产量是二千五百七十八万公吨，我国比美国要少四百七十八万公吨。今年我国单是冬小麦的产量，就比美国去年冬麦和春麦的总产量超过六百二十二万公吨。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变化。

今年我国冬小麦丰收；美国冬小麦也丰收，照他们自己说来，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丰产纪录”。同样是丰收，但是双方气候条件大有不同。美国的丰收，是碰上了象美国农业部所说的“理想的”气候。我国的丰收则是在干旱条件下，经过同自然界搏斗而得来的。虽然如此，我国冬小麦产量还是比去年增加了一千一百万公吨，美国的冬小麦也不过增产了九百八十四万公吨。而美国的春小麦，今年还比去年减产一百零四万公吨。

美国在小麦总产量方面既然已经被我国所压倒，今后肯定将永远地被我国所压倒。这是由两方面的条件决定的。美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生产过剩状态。因而小麦种植面积，已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的二千七百七十五万公顷，缩减到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七百六十七万公顷；冬麦和春麦的产量由三千一百零六万公吨下降到二千五百七十八万公吨。尽管美国政府用减少种植面积、压缩产量、实行对外倾销和其他各种办法，但是他们仍然避免不了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美国小麦生产的基本趋势是在走下坡路。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大跃进，而且会一跃、再跃，不断地跃进。我国小麦平均亩产量从去年的一百一十二斤八两增加到今年的一百八十斤，已经超过了美国一九四七——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七十二斤的平均亩产量。虽然我们还低于美国今年的二百三十一斤的每亩平均产量，但是对我国大跃进的农民来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平均亩产量，是毫无困难的。我国河南省全省平均亩产量已经达到二百五十四斤，超过了美国；而目前我国小麦的最高纪录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等于一公顷产五十四点九公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因此，我国小麦增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单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小麦总产量就必将远远地把美国抛在后边。

人们知道，小麦本是杜勒斯进行政治讹诈的一张王牌。在世界市场上，小麦的流量，一年只有二千到二千七百万公吨，其中美国占很大的比重。一九五七年是美国小麦出口最多的一年，共出口一千一百三十二万公吨，面粉一百二十万公吨。靠这些资本，杜勒斯就大干起政治投机，到处横行霸道起来，无论是进行对外“援助”也好，“救济”也好，“经济合作”也好，都是气势逼人。其实，在世界上进口美国小麦的三十六个国家中，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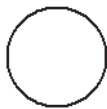


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一年进口四十万公吨以上的只有五个国家。

忍气吞声地吃美国小麦，这是一条道路；依靠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是另一条道路。我国沿着后一条道路前进，已经获得惊人的胜利，这对于全世界的经济落后国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今年我国仅是冬小麦的增产量，就抵得上一九五七年美国小麦的输出总量。历史是如此无情。美国小麦的总产量，竟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一个素来被他们视为“落后的”国家所超过。这就不能不严重地打击这个奸商兼流氓的威风。

吃美国小麦，常常使人气得肚子发疼。所以美国小麦象瘟疫一样，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咒骂。在这一方面，铁托可算是一个突出的例外。他在拉宾演说中，谄媚地夸奖美国小麦香得很。他说：“美国的小麦是每个世界市场都非常需要的商品。……对于我们（铁托们）来说，所有这些（指美国商品）都是非常好的商品，是世界上价值非常高和非常有用的东西”。这样四个“非常”，确实证明美国小麦对于杜勒斯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同时也将铁托出卖灵魂、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一付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铁托所吃的美国小麦的价值确实是“非常高”的。南斯拉夫十年来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其中包括剩余农产品协定，救济援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美国在南斯拉夫进行海外采购的协定，动用对等基金的协定，美、英、法三国对南经济援助协定，共同防务援助协议，根据美国共同安全法案签订的协定等等。这些协定实际是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协定，其中既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也没有什么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气节，而是道地的卖国主义。

十年前，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太多，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没有一个政府成功的”。当时许多美国报纸的新闻记者，纷纷叫嚷：中国只有向美国乞讨小麦和面粉，才能活得下去。他们还梦想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扼杀中国的经济。曾几何时，他们的幻梦就一个一个地破灭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多不但不是“压力”，而且是对发展生产最有利的一个条件。中国人不依靠乞讨过生活，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小麦总产量飞快地就超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必将大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大大扩大社会主义的国内市场，使帝国主义者的封锁政策，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讽刺。





# 除四害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楊杰

除四害是我国人民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取得这个斗争的彻底胜利。半年多来，安徽省的除四害运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次除四害运动规模之广、声势之大、消灭“四害”之多、卫生状况改善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运动高潮期间，全省平均每天有一千余万人投入除四害战斗，最多的时候，达二千五百多万人。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五月，全省消灭老鼠和麻雀达三亿四千多万只，消灭苍蝇和蚊子达一千余万斤。此外，还消灭了大量的其他害鸟、害兽和害虫。在大搞除四害的同时，各地还普遍地大搞了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半年多来，全省清除垃圾四十七亿五千多万担，清理污水沟一亿二千一百六十多万公尺，填平污水塘、污水坑洼六千九百三十多万平方公尺，新建和修建厕所三百七十八万多个（绝大部分是有房、有门、有盖的公共厕所），新建和修建牲畜圈栏二百四十二万多个，彻底改变了过去千百年来，淮北广大平原“人无厕所猪无圈”的陋习。全省从城镇到农村，家家户户的室内、室外普遍进行了多次大扫、大搬、大洗，处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勤洗衣、勤晒被、勤洗澡、勤剪指甲、刷牙漱口、不随地吐痰等爱清洁、讲卫生的新风气，正在广大农村和城镇中盛行起来。

这样一件移风易俗、振奋人心的大好事，所以办得成功，就是因为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因为在工作中执行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方针；克服了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只凭少数人包办代替的错误方针。这种正确方针和错误方针的斗争，鲜明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在“四害”能不能消灭的问题上，不相信群众力量的人，认为“四害”自古以来就有，麻雀天上飞，老鼠洞里钻，苍蝇、蚊子遍地皆是，繁殖很快，要把它们全部消灭干净，这简直是神话。他们中间，有的说城市里可以消灭“四害”，农村里消灭不了；平原地区可以消灭“四害”，山区消灭不了。有的虽也承认“四害”能够消灭，但却认为消灭“四害”是遥远的事，短时间是除不尽的。总之，他们对于能否除尽“四害”，都抱着怀疑态度。

相信群众力量的人则不然。他们也认识到“四害”确有数量大、繁殖快，而又善于潜藏的特点，要把它们消灭干净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除尽“四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人民对于消灭“四害”有着迫切的要求和强烈的愿望。就是在过去，人们也是十分仇视“四害”的。全椒县在过去有这样一首民谣：“白日贼（指麻雀）、夜强盗（指老鼠），白天田里偷，晚上家中盗，吃了我的粮，咬破衣和袄，告不通，骂无效，一肚子恨消不了。”可是，广大劳动群众过去处在旧的社会制度下，饭不充饥，衣不蔽体，即使想同“四害”斗争，也只能养一只猫捉老鼠，扎一个草人在田间吓唬麻雀，烧点蚊香熏蚊子，蚊子叮到身上用扇子打一下，苍蝇飞到正在吃的东西上用手赶一下。人们在这种斗争中，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多年来，人们就想改变这种被动的地位，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一直不能实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曾经有过驱除四害的愿望，他因为找不到实现这个愿望的社会力量，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他幻想中的“小猎人”和“小猎犬”。

现在我国的情况和过去根本不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我国英雄的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获得了解放。他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敢于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困难，不再盲目地作“天老爷、地老爷”的奴隶，而要作自然的主人，向自然发号施令，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他们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巨大力量。有了这种力量，莫说小小“四害”，就是强于“四害”千倍、万倍、万万倍的敌人，也要把他们打得稀烂。有了这种力量，我们就可以在同“四害”的斗争中，把过去的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就可以对“四害”打主动战，打歼灭战，犁庭扫穴，斩草除根，要“四害”断子绝孙。尽管“四害”中，有的会飞，有的会钻，有的会藏，但是它们只不过有“一能”。人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有万能。以万能对一能，四害哪有不能消灭之理？

二、在依靠谁来消灭“四害”的问题上，不相信群众力量的人，不去积极地发动群众，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群众来消灭“四害”，而是落在群众的后头，零打碎敲，不痛不痒，不深不透地搞一下。有的抱着无穷的忧虑，把除四害和生产完全对立起来；他们不懂得除四害有利于生产，而且完全能够围绕生产、紧密结合生产来进行，因而他们不愿意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来除四害。有的认为除四害困难很多，枪械少，药物少，讲卫生要花钱，群众中的一些旧习惯一下子改不掉，因此就在困难面前踌躇不前；别的地方搞得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他们那里却总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有的虽然口头上也要发动群众，但是实际上不作细致认真的工作，不从思想上动员群众，不从组织上发挥群众的力量，在指导方法上也没有很好地抓两头带中间；结果他们那里虽然也消灭一些“四害”，但斩获不大，卫生方面也搞不出显著成绩。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人，对于依靠谁来消灭“四害”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执行省委提出的“以治水的干劲来扑灭四害”、“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变被动为主动”的指示，在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同时，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对“四害”展开了强大攻势。他们在运动实践中找出一个可贵的“大”字来，这就是除四害必须大动干戈，大讲特讲，大干特干。在思想工作方面要大宣传，大动员，使人人懂得为什么要除四害，人人仇视“四害”，人人动手消灭“四害”；在对“四害”作战方面，要进行大搜索，大围剿，各路大军在同一时间内统一行动，多搞工具，到处撒下天罗地网，使“四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跑到哪里，就被消灭在哪里；在清洁卫生方面，要进行大扫除，大搬家，大洗刷，大泥刷，做到处处干净，没有死角；在消灭蚊蝇孳生场所方面，要大普查，作出通盘规划，结合积肥，大挖大填大清理。有了这个“大”字，就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切事情都好办了。许多原来认为不能解决的困难，现在都已解决或正在解决中。过去有人认为山区麻雀难除，现在这个问题在舒城县（大部分面积是山区）已经解决了，他们在今年三月下旬的一次大围歼战中，就消灭了九十四万多只麻雀，连同大围歼战以前和以后消灭的麻雀达四百万只，目前在全县境内已很少看到麻雀。过去有人认为老鼠在墙洞里钻，难以搞尽，现在许多地方老鼠已经绝迹。有个三里贩村，共二十三户人家，通过积肥，拆陈墙换新墙，在几天内就捉到一百多窝大小老鼠（每窝六只到八只），一次就将全村老鼠的子孙三代全部灭光。过去有人认为苍蝇难消灭，特别是城市中的一些动物羽毛皮骨血肉加工业更困难；现在许多地区，经过彻底挖蛹、灭蛆、加强粪便管理和随时捕打等综合措施之后，苍蝇已比过去显著减少，在蚌埠市和界首县等地已基本上看不到苍蝇，以“苍蝇公司”著称的蚌埠肉类加工厂，现在已经做到无蝇无蛆了。过去有人认为城镇内整修道路、填污水塘、搞环境卫生都要政府拿出大批的钱来；在这一次除四害的大运动中，情况完全变了。蚌埠市过去计划市内的填塘、清沟工程要花三十六万多元，拖了几年没有进行，这次运动中，只花了八万多元，全部计划工程都完成了，真是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三、在怎样消灭“四害”的问题上，不相信群众力量、不走群众路线的人，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办法，单纯地依靠少数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办法。结果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办法，有时想出条把两条办法，由于不符合实际情况，拿到群众中去也不受欢迎。有一个地方曾经向一位“专家”请教除四害的办法，他想出了一些什么办法呢？第一个是“六六六”，第二个也还是“六六六”，除了“六六六”以外，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些同志最大的缺点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甚至在农村已经到处都在用闹洋花、猫儿眼、辣蓼子等野生植物杀蛆，而且非常有效时，我们省卫生部门里有一位同志还说：“我一直怀疑，这



些野生植物灭蛆的效果究竟怎样。还未经过卫生机关鉴定哩，不能算数！”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人，十分注意群众的智慧和创造。他们相信群众中有天才，明确认识到，好的办法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土专家的土办法，经常到群众中去找办法，并且使专家和群众结合起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例如阜阳县苏集区区委書記王怀君同志，今年二月初在区委掌握的重点黄庄寨村召开了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加的座談討論会，针对麻雀十分狡猾的特点，討論消灭的办法，大家在分析了麻雀的飞翔力不强，耐饿力很小等弱点之后，你一言我一語地扯出了一个天罗地网大围剿的办法来。经过充分研究和准备，本着大胆試驗的精神，在今年二月十一日来一个全区性的对麻雀的大围剿，六万二千人（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的大軍，連續大围歼三天，一举肃清该区残余麻雀。由于省委对这一經驗的提倡和推广，至今年四月二十日，全省有五个市、五个专区、四十个县运用了这一战术，消灭了大量的麻雀。再如舒城等地群众用闊洋花、猫兒眼、辣蓼子、枸杞果、醉魚草等有毒性野生植物灭蛆，效果很好，现在全省各地已普遍采用。凤台县關町区今年五月八日这一天发动二千一百多人在收工回家时，順便采集了二万零五百八十斤猫兒眼，放在一千多个粪缸和粪池中，两天之内将蛆全部灭光。肖县全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粪缸都采用猫兒眼灭蛆和防止生蛆。据銅官山的試驗，闊洋花不但可以杀蛆，而且用米灭釘螺、灭蝇、灭蚊、灭孑孓、灭臭虫都有效。现在金寨、南陵、歙县、宣城等地又发现草烏、头疼花、菜药、鬼柳叶子等二十多种有毒性野生植物可以杀蛆。这种运用野生植物毒杀蝇蛆的办法是群众创造的，推广开来也是要依靠群众的。“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只有当地群众才了解野生植物，才会使用野生植物；一个蹲在城市里的人，不仅不会使用野生植物，对它也是認不得、找不到的。

从群众所创造的多种多样的除四害經驗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人民群众的才智好象大海里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我們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們就是战无不胜的。

总之，除四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又一次生动地証明群众路线这条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的正确性。搞革命要走群众路线，搞建設也要走群众路线，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统统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工作都要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党的責任，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向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不断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无穷的智慧和創造力，讓千百万群众起来自己动手，創造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福建一个乡的奇迹

福建省教育厅

在方言区的男女老少的农民中间普及普通話，这件事全国直到现在还只有一个乡作到，而这个乡恰恰是方言最难懂最复杂并且是交通最闭塞的一个乡——福建省中部大田县的吳山乡。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现在，吳山乡二千三百七十九名青、少年和壮年农民中，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七的人能够講普通話。少年和青年人学习普通話的成績最显著，全乡一千五百零三名青、少年中，百分之八十五能講普通話。老年人对学习普通話也不甘落后，有些老大爷和老大娘，不但能听懂普通話，而且还能用普通話和人們打招呼。现在，你只要走进吳山乡，不但在小学校和民校，而且無論在家庭、在会场、在田間、在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清晰而流暢的普通話的交談声。

吳山乡可以说得上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就是从大田县城去吳山乡，也要翻越几十座大山才能到达。吳山乡从来就以交通闭塞而著称。解放以前，吳山乡的农民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終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火籠当棉袄”的凄苦生活。在文化生活方面，全乡除了少数地主富农分子以外，絕大部分农民都是一字不識，而且方言非常杂乱，

有閩南話，有永安話，有大田县的城关話。

在解放初期的几年中，在吳山乡工作的干部大都是从北方来的。这些北方来的干部，一般都是用普通話談話或作报告，这对当地农民來說是最苦恼的事情。他們說：“普通話，听不懂，好象鴨子听雷轟。”不但如此，而且由于方言紛歧，就是到外县或者本县稍远的地方，說話也很困难。有个木工陈賢才，在去年要去参加厦路大桥工程，高高兴兴跑到永安，却因为言語不通，迷失了道路，只好又跑回来，白跑了七八十里路，使他两三天不好意思見人。有些乡干部到县委去开会，会上交流經驗的发言他們听不懂，回到乡里传达几句就完了，脸上发紅很难受。还有一件使他們感到最痛心的事：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个会說普通話的地主分子陈宗源，假装进步充当翻譯，他利用群众不懂普通話的弱点，常常把好話翻成坏話，把好事办成坏事，使吳山乡的农民吃了很大的亏，吳山乡的工作受了一定的损失。

在政治上、經濟上获得了解放的吳山乡农民，积极地要求文化上的提高；学习普通話，使用普通話，已經成了吳山乡多数农民的迫切要求之一。中共吳山乡委員



会和共青团吴山乡委员会，根据上级党和政府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研究了吴山乡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除了广大农民对学习普通话的迫切要求外，解放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全乡扫盲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百分之四十八的壮年人，摆脱了文盲状态。群众经过多年来和北方干部的接触，耳濡目染，有许多人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听懂些普通话了。这些都是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因此乡党委和乡团委在今年三月底提出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号召后，立即得到了全乡大多数农民的响应。

在这样的农村中推广普通话，当然不会没有阻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喜欢学普通话的人却喜欢取笑积极学习普通话的人。如有一个妇女说：“普通话是干部讲的，不是群众讲的。”有一个农民还说：“干部讲起普通话来，舌头那样软，是吃油吃的多；我们的舌头硬，讲不了两句，就冒出汗来了。”有人公开打击学讲普通话的人的积极性，使想学普通话的人增添了许多顾虑，既愿意学，又怕别人取笑和讽刺。这种现象，当然影响着普通话的顺利推行。在这种情况下，乡党委和乡团委，先后召开了党员会、团员会、干部会、妇女会、民校教师会、群众大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由内到外，由上到下，层层进行动员，并发动了群众诉苦。诉苦就是诉不会讲普通话

变成“哑吧”的苦，诉听不懂普通话变成“聋子”的苦。接着便讨论学习普通话的好处。经过讨论，群众认为学习普通话有三大好处：一是便于提高政治觉悟，二是便于推广工作经验，三是便于日常生活。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大大地启发了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坚定了群众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大家纷纷写了决心书，并提出了“苦战五十昼夜，人人学会普通话”的响亮口号。

吴山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青年要带头学，带头讲；二、全体群众，无论开会、在家、上山、下田、赶集、进店，处处学，处处讲，边学边讲，看什么讲什么，形成群众性的学习热潮；三、实行包教包学，小学教师和民校教师教学生，学生回去分片包干教群众，展开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儿女教双亲的互教互学运动；四、开展学习竞赛，定期进行表扬和批评。对大胆学、大胆讲的人及时给以表扬，对不积极学习的人在民校用大字报进行批评。在党内、团内更把对推广普通话，学习普通话的检查作为小组会的主要内容之一。

吴山乡采取了这许多有效的行动和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了“人人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各生产队里都组织了学习普通话小组，一面在田里劳动，一面学习普通话，做什么就讲什么，看见什么，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大家最喜爱这样的学习方法。农民陈林贵说过：“我们在田里生产，耳朵听，嘴巴讲，不觉劳动时间长。”在学习普通话的过



程中，青年妇女的劲头也很大，她们开始学的时候，还感觉到不好意思，总是偷偷摸摸地讲，后来越讲越大胆了，她们中有些人比男人学的还快还好。少年儿童对学习普通话更是积极，他们无论在家庭里在学校里一律学着用普通话讲话，不会了，立刻问，立刻讲。有些没有入学的牧牛童，也都组织了学习普通话小组，他们把牛放到山上去吃草，就凑集在山坡上，一边学识字，一边学讲普通话。在吴山乡，学普通话，讲普通话，已经成了群众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现在对讲普通话的人进行取笑的现象没有了，相反地是不讲普通话的人，倒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比如，你打电话时不讲普通话，对方就会立刻给你纠正，你进店买东西不讲普通话，店员教会了你才把东西卖给你。就这样，全乡从三月底到五月中旬，仅仅五十天的时间里，便基本上普及了普通话。

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除了以上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中共大田县委对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给了大力支持，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全县工作任务之一，及时进行布置检查，并作到使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和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大田县教育科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中，也非常积极主动，他们及时搜集了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及时向党委反映，起了党的助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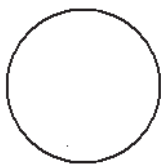
(二) 吴山乡的干部具有共产主义的

风格，他们敢想、敢做、敢于打破陈规，领导群众用大跃进的精神推广普通话。同时，干部在学习普通话中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乡团委书记陈进四，她在一九五二年速成识字班毕业以后，就担任民校教师。她是吴山乡第一个学习讲普通话的人，普通话讲的满流利。她不仅是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而且是生产中的能手，全乡青年都以陈进四作为自己的榜样，向她学习。

(三) 吴山乡有一支推广普通话的教师队伍。全乡有民校六十所，民校教师一百人，他们都会讲普通话，用普通话教学。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分散到全乡各个角落去推广普通话，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经验证明：在目前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形势下，推广普通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已经成了群众的切身要求，推广普通话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有些人认为推广普通话和扫盲、生产工作相矛盾。但是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经验说明，推广普通话不仅没有妨碍生产和扫盲，而且还可以互相结合，互为推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吴山乡的经验证明，事在人为，党和群众的正确的决心可以战胜任何困难。吴山乡给全国农村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树立了鲜明的旗帜：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同样可以大跃进。在福建省这样一个偏僻山区能够做到的事情，别的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呢？



## 南充专区发展地方工业的几点經驗

戈潤生 卫广平 曹廷明

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四川省南充专区地方工业的发展，有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間内，全专区就建立了四万三千多个工厂，其中有肥料厂一万三千多个，农具修配厂四千六百多个，农副产品加工厂二万四千六百多个，小型水电站六百八十四个，石灰等厂八百多个。这些工厂，象满天星斗，遍布农村。这是南充专区地方工业大跃进的第一个高潮。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小厂的作用，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机械化，南充地委在六月初又发出了建立鋼、铁、煤、机械、水泥、中型电站和化肥等地方骨干工业的指示。这一指示，立即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掀起了兴办地方工业的第二个高潮。几天时間，全专区就建成十七个机械厂，仅南充市一天就建成四个化肥厂。由于采取一边建設一边生产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全专区化肥厂已生产化肥一百二十一种，产量达一千五百多吨；过去不能制造的鼓风机、内燃机等，现在也将成批生产；过去不能炼铁，现在正筹建年产十万吨的炼铁高爐，今年大有可能生产一万五千吨到两万吨铁；过去水泥是从外地买，现在已建成一座水泥

厂，到八月底将建成十二个水泥厂，日产水泥一百一十八吨；煤产量也将由去年六万吨提高到八十万吨。

大规模地兴办地方工业，对我们还是一个新的問題，已經取得的一些成績，也只是个开始，但是过去一段时間的实践，証明有几个基本經驗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第一，必須圍繞着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設来发展地方工业，使地方工业密切地为农业服务。去年冬季农业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工业也来个“大跃进”，南充专区的“地方工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办起来的。现在地方工业在支援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已經初步显示出来。例如，全专区的农具厂为农业社制出了各种农具一百五十七万多件；饲料厂加工的饲料达十五万多吨。又例如，西充县全县三百多个农具工具制造厂，制出車子两万多部，使全县絕大部分耕地，都能直通車輛，再也不用肩挑背馱，运输效率提高三倍以上。南部县制造出两万部紅荅刨厢器，比用鋤头刨厢提高工效十六倍，使紅荅栽播提前了十天。全专区所建的饲料加工厂，保证了猪饲料的充足供应，使生猪由去年年底三百万头突增到四百万头以上。人造纖維厂的建成，使許多无用之物变成珍宝，大





大增加了农业社和社员的收入。此外，全专区有一百九十九个社，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六户社员，已经安上了电灯。广大群众对发展地方工业非常高兴，他们赞扬说：“共产党，毛主席，好主张，领导我们建工厂。建起化肥厂，保证亩产千斤粮；建起农具厂，农具工具换新装；建起加工厂，增养生猪有保证；建起纤维厂，要穿新衣裳。开采煤和铁，支援大工业；建起机器厂，铁牛进农庄；修起水电站，黑夜放白光；乡乡社社办工厂，真是毛主席的好主张。大家努力干，多快好省往前赶，十五年，哪用十五年，定把英国丢后边。”又说：“一根扁担长又长，挑起担子赶太阳。一头挑的工业化，一头挑的千斤粮。工业农业两条腿，两腿走路快如飞。社会主义早实现，幸福生活在前。”这些顺口溜，不但唱出了地方工业对于改变农村面貌、繁荣农村经济的作用，而且唱出了群众对举办地方工业的欢欣心情和充分的信心。

第二，兴办地方工业必须以小型工厂为主，同时也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建立一些专县工业，作为地方工业的骨干。以小型为主，是因为它投资少，便于吸收闲散资金；设备简陋，易于利用当地各种现成设备；接近原料产地和市场，易于降低成本，使供产销易于结合；容易就地灵活使用劳动力，有工即来，无工则去，农闲即来，农忙则去；建厂时间短，见效快。小型工厂的这些优点，使得它非常受群众欢迎，很容易大批地办起来。但是，如果只注意办小型工厂，而不积极发展专县骨

干工业，这些小型工厂的潜力就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发挥作用，就不能进一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机械化。例如，许多农具、工具制造修配厂需要钢铁，这就要求建立钢铁工业。许多水电站修成了，需要发电机和皮带，这就要求建立电机制造厂、皮革厂。许多工厂需要煤，这就要求建立煤炭工业。许多农具工具制造厂进一步需要机械装备，这就要求建立机械工业。又如目前全专区车子、水车、打谷机、轧花机等，急需滚珠轴承六十万套，用手工制造，二千个铁工八年才能造出来，如果有二十部冲床操作两个月就可以全部制造出来。由此可见，根据本地的条件，建立一些规模较大的，技术上较先进的专县工业，用它作为核心，带动小型工业普遍发展，逐步提高，使地方工业能够更好地为农业服务，这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必须贯彻执行依靠群众、全民办厂的方针。执行这个方针，不但可以使广大农民积极地参加工业建设，既为农亦为工；而且可以使城镇居民也积极参加工业建设。同时，财贸系统各单位也结合自己的业务，大办工厂，既为商亦为工，例如，全专区仅供销社一个系统，三个月之内就办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工厂。学校和卫生部门也结合自己的业务，兴办了化肥、医药等工厂；甚至有许多少年儿童，也利用课余时间采集人造纤维原料，支援办工厂。这样一来，办厂所需的资金、技术力量、资源勘察、设备等问题，都很快地顺利地解决了。南充专区办了这样大批的工



厂，一没有要国家增加干部编制，二没有要国家修建厂房，三没有要国家增加投资，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建立煤、铁、机械、炼油、化肥、水泥等较大的工厂，是需要一些设备和技术力量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单纯地眼睛向上，单纯依靠国家。最近两个月来，不少的县派人到成都、重庆争买机床，但因供不应求，结果大部分空手而回。有的县要制造新产品，需要翻砂工人，要求专区给他们解决，专区同志就告诉他们，到群众中去找，结果全专区发现了各种技术工人两千多名。南充市基础比较好，但是要想办比各县大一点的工业，也碰到技术设备不易解决的困难。但是他们把原来零星修配制造的机械设备组合起来，建立了“上游机械厂”，“红旗农具制造厂”等六个机械厂，也就把问题解决了。这种自力更生的办法，最大地挖掘了设备潜力，最有效地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并为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逐步实现机械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石。事实证明，只要眼睛向下，自己动手动脑，充分依靠群众，就能最彻底地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而也就能够解决许多最初看来不易解决的困难。

我们在建厂和生产的过程中又一再强调了相互协作、相互支援。仪陇县开盐井没有技工，产盐的南部县，就很快派去了技工支援，结果仪陇县的盐井迅速投入生产。南充市铁业一社和机修社，一家要制造拖拉机，一家要装配汽车，一个缺乏技

术，一个缺乏零件，两厂来了一个共产主义大协作，又取得了另外三家厂的支援，汽车和拖拉机都制造出来了。我们必须发扬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气，反对本位主义，搞好大协作，互相支援，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第四，为了真正地把干部和群众办地方工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还需要做许多思想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破除各种迷信观点，扫除自卑感，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新风格。南充专区地方工业大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许多事实证明，每当打破一次迷信观点，人们的思想就大解放一次，工业也就向前大跃进一步。例如，曾经有许多干部认为：“工业高不可攀，专、县办不了工业，乡、社更不用说了，办工业是中央和省的事情”。当活生生的事实把这个迷信打破以后，各级干部的思想就打开了，胆子壮大了，敢于动手到处办工厂了，于是，乡、社办工业的高潮就势如潮涌，一浪高一浪。但是在这种迷信打破以后，又出现了“既抓农业，又抓工业，会影响农业生产”的疑虑，认为“搞农业，劳动力已经很紧张，再搞工业，劳动力更调不过来”。可是，有的地方大办工厂以后，机械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不但没有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引起劳动力的紧张，反而腾出了劳动力去搞农业。事实使人们相信了“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快”。后来，有些人又对举办化肥、机械、冶炼、采矿、地质勘探、水泥等科学技术



性比较强的工业畏缩起来，认为自己不懂技术，无法进行，认为科学技术必须是文化很高的人、专家才行，我们是“土包子”，搞这些厂不行。总之，把科学技术看得极端神秘，高不可攀。当我们采取突破一点，大规模地组织参观、现场表演、样品展览等方法以后，情况就大变了。人们说，科学技术也不是那样的不可捉摸，也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困难。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以后，就用许多的土办法，简陋的设备，搞出了大量的奇迹。石油炼出来了，钢铁炼出来了，锰钢工具出现了，拖拉机装配出来了，汽车装配出来了，一六〇五药剂、六六六粉都造出来了。过去有人说滚珠轴承“只有外国才能制造”，现在我们造出来了。过去有人说“在船上安装发电机，用水力发电，违反科学原理，不能成功”，可是现在电也发出来了，八十多户人家用船上发出的电，已经点上了电灯。人们认为最难的是空中取氮，但我们也试验成功了。用猪脑髓提取高级医药用品——胆固醇也成功了。全专区原来准备用五年时间达到的十五万吨化肥的计划，估计今年就可能实现。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只要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群众的智慧和作用，就将更大地发挥出来。

第五，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这是建设地方工业最根本的保证。过去的许多经验已经证明，要完成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都必须书记亲自挂帅、全党动手才行，这次发展地方工业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只有书记把工业抓起来，

把全党的力量动员起来，才能率领群众，破除迷信，势如破竹地把工业一批一批的建立起来。四川省委召开的工业规划会议和党代表大会，使地委和县委同志明确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明确了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乡乡社社办工业的思想。因而各地各级在这一次举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抓得紧，建得快，阻力小，很快就快形成了高潮。南充县委因为第一书记挂帅，亲自主持召开三千多人的工业会议，亲自下乡指导建厂，因而该县就迅速建成六千七百多个厂子。这可以代表大部分县的情况。但也有个别的县，如阆中县委第一书记起初很少过问工业，因此全县到四月底仅建厂四十多个，五月以后书记挂了帅，全县党的组织一起动员，工业就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这个县已经建立了五千七百多个工厂。这个例子说明党的领导对于发展地方工业是多么重要。

要很好地实现党的领导，除了要始终注意执行上述几个重要方针之外，根据我们最近的体会，还要从工作方法上抓好重点，以研究典型和种试验田的办法指导地方工业的全面跃进。同时，还要注意抓计划、抓措施、抓干劲、抓检查，解决执行计划贯彻措施的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精神奋发，热情洋溢，干劲十足；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厂很快走上正轨，保证生产计划的实现。

（编者按：本文作者戈润生是中共四川省南充地委第一书记，卫广平是书记处书记，曹廷明是工业交通部部长）

